

書名：《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叢書

主編：程章燦

出版：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2023 年

由程章燦教授主編的十卷本《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叢書陸續出版，共計十卷，第一卷趙益著《中國古代文獻：歷史、社會與文化》，第二卷徐興無著《早期經典的形成與文化自覺》，第三卷于溯著《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第四卷鞏本棟著《宋代文獻編纂與文化變革》，第五卷俞士玲著《明代書籍生產與文化生活》，第六卷徐雁平著《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第七卷張宗友著《治亂交替中的文獻傳承》，第八卷程章燦著《作為物質文化的石刻文獻》，第九卷金程宇著《漢籍東傳與東亞漢文化圈》，第十卷程章燦、許勇編《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史料輯要》。叢書以文獻切入文化史，志在建構一種新的“文獻文化史”研究視野與方法，是當前中國書籍史研究的一次突破。該方法一方面繼承傳統文獻學立足文本考證的長處，尋求從文本到文化的超越；另一方面重視書籍史研究的本土化，呼籲從自身特點出發，以“文獻”突破“書籍”的限制。

在中國文明進程中，文獻是一種特殊的存在，對於文化延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古人對此早有察覺，《論語》載孔子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漢鄭玄注：“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宋朱熹《論語集注》解為：“文，典籍也。獻，賢也。”可見孔子以來，學者均意識到文化傳承主要由典籍與人兩部分構成。人的代際傳承具有流動性，最終仍要依靠物質性的典籍留存下來。承載了文化體生命印跡的文獻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結合，人的思想與精神切片存於典籍，典籍以其物質性將流動在時間中的文化烙印於空間中。因此，文獻本身構成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考察一種文獻特質，

可以進而窺知其背後的時代知識與技術、社會與文化；比較各文化體文獻形式、內容及其所衍生的制度差異，可以釐清文化體的自身文化特質何在，探尋自身傳統特色。中國文化與古典文獻始終纏繞在一起，通過古典文獻考察中國文化，以文化視角關照文獻，可以同時揭示二者被遮蔽的面向。

中國古典文獻產生時代甚早，出土實物可證至晚在殷商時期即有甲骨金石契刻，同時及稍後又盛行簡帛書寫與造紙雕版；這些文獻數量極夥而類型豐富，除典籍外，還有諸如律令文書、契約賬冊、金石契刻、書畫卷軸等。不僅文字書寫傳統源遠流長，由此展開的一系列文獻生產、閱讀活動和奠基其上的歷史文化制度亦蔚為大觀，歷史悠久的官方藏書機構、史官記事傳統、文書行政系統、科舉制度即是明證。豐厚的文獻傳統孕育出成熟的古典文獻學體系，包括了校勘學、典藏學、版本學、目錄學等分支，通過對文獻文本內容、物質形態、收藏傳播、分類接受等過程考鏡源流，提供了寶貴的學術傳統與資源。但是這一傳統偏重文獻物質形態本身的研究，未能深入抉發其文化史意義。

另一方面，西方以書籍史為代表的新文化史研究在二十世紀中業興起，以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和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人為代表，特別注重書籍對文化特別是大眾社會文化變革的影響。換言之，書籍史研究將視點從文獻本身挪移至文獻與文化之關係，將人文關懷與問題意識賦予下層民衆，而不是將文獻懸擱於人之外。不同學者以不同側重點對圍繞書籍生產、傳播的一系列環節分而治之，合而統之，將書籍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在此基礎上又興起閱讀史的研究，學者將讀者的閱讀接受視為書籍史的重要部分，強調書籍生產出來後之“用”和讀者之反作用，進一步明晰書籍產生文化效應的全過程。不過，此類書籍史研究圍繞西方書籍及其歷史語境展開，關注其對大眾的影響和歷史變革性，對書籍以外的文獻形態、近代以前的文獻文化缺乏關注，無法直接移植到中國文獻語境。

因此，結合文獻學傳統和西方書籍史研究，立足中國典籍本土特色，加以文化關照，重點關注古典文獻與中國文化之纏繞，是呼之欲出的研究趨勢。十卷本《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叢書即圍繞“文獻”“文化”兩個支點及其關係展開，既在傳統文獻學的延伸線上省思文化的形成，也在文化史的框架下重審文

獻的意義。該叢書以專論形式，各取古代文獻一個時期的某些特點，或某種特定形式的文獻，以點帶面，縱橫構成古代文獻文化的總體。具體而言可分為三個部分：首卷緒論乃古代文獻文化的總體把握與理論建構，第二部分（二至六卷）以斷代形式分論不同歷史時期的文獻面貌，第三部分（七至九卷）以專論形式分論古代文獻的一個特殊面向，最後附以卷十《史料輯要》。

首卷趙益《中國古代文獻：歷史、社會與文化》總論文獻文化史研究的必要性與突破性，認為中國文獻傳統的特點在其連續性、穩定性與精英性，特別指出文獻的存亡最終取決於其內容是否為社會所認可和需求，不存在“絕對受制於外力的偶然性”。末章分析中國“文化共同體的獨特自性”，認為作為文獻共同語的書面語（漢字）構成了中華文化共同體認同的基本要素，是文獻文化形成的基礎。

卷二徐興無《早期經典的形成與文化自覺》專論先秦兩漢文獻。作者拈出“經典化”概念，指出早期經典在不斷闡發中實現自身，其思想史意義早已超越物質屬性。通過考察前軸心時代的文本書寫、諸子“立言”傳統、漢代六經次第變化、讖緯文獻結構等，梳理了先秦兩漢典籍文化觀念變遷，體現出文化的轉型，即由先秦時期禮制與諸子主導的文化轉向中古政治權威與宗教信仰主導的文化，而探索哲理與道德的興趣轉向了知識與法術。

卷三于溯《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專論中古史部文獻的崛起。作者尋求新角度認識文獻生成和傳播的單位，即三種形式的中古文獻“文本單元”：卷（單卷獨行）、事（獨立事件）和模塊。文本模塊具有兩個核心特點：組合隨意與功能獨立，可以組合成多卷帙的史書，形成新的書寫特徵。作者還指出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類”化的時代，如類書的出現，目錄學的發展，每一種知識獲得類的歸屬。在“類”的文化中解讀《五柳先生傳》，或能有別開生面的發現。

卷四鞏本棟《宋代文獻編纂與文化變革》選取宋初四大書、經部文獻、北宋私家藏書、南渡之際文獻傳承等個案，從文獻編纂看雕版興起後出版文化的轉變，勾勒宋代思想文化演變軌跡。如考證舊題孫奭的《孟子注疏》作偽者實為書商，《孟子注疏》是孟子升格運動下民間學者、坊間書商與官府互動下的產物。又以《古文真寶》為例將視野擴及東亞漢文化圈，論述選本透露的南宋理學思想之下沉。

卷五俞士玲《明代書籍生產與文化生活》圍繞明代圖書生產行為(包括著作、刊刻、交易等環節)與生產者(作者、讀者、書坊、政府等)之互動展開,如以三份購書單為中心,勾畫明代圖書生產版圖,把握正德間官刻、私刻、坊刻之分量構成,進而分析明代學風之動態變化。作者志在剝除明代書籍史研究的“多重葛藤”:譬如以“明人刻書而書亡”為代表的對明代刻書的全盤否定,對官刻、家刻、坊刻的截然三分,以商業出版研究統攝整個明代書籍史的思維定式等。

卷六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強調研究“動態的文獻”或者有“社會情緣的文獻”,考察作為“生命體”的書籍生產、流轉的過程;以“群”為方法,圍繞清代文獻“集群”與“人的集合”之關係,刻描各類中下層群體著書、賣書、看書、抄書過程所體現的多元文化。全書以日記題跋、購書清單、讀書指南、家集朱卷、女性著作、新學書籍等文獻,考察書估與抄手等潛隱群體、地方文人傳統、考據學興衰起落、女性自我覺醒、晚清科舉文化變革與西方思想衝擊,視角與方法均別開生面。

卷七張宗友《治亂交替中的文獻傳承》旨在分析文獻傳承的內在理路,認為古典文獻在注解、新纂中傳承發展,具備強大的文化內驅力,也依賴於知識階層傳承文獻的使命自覺,以及帝王為維護統治合法性建立的文獻纂修傳統。這一理路可以從《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目錄學演進中得到揭櫫,乾隆《四庫全書》的纂修作為代表性事件,可以窺見皇權與知識階層如何合作實現文獻傳承。

卷八程章燦《作為物質文化的石刻文獻》超越以往石刻研究偏向史料和史學研究的格局,從物質文化角度深入石刻生產、使用、閱讀、傳播全過程。以“物質性”而言,石刻天生具備權威性與展示性;以“文獻性”而言,石刻由於其文字而深度參與古代社會文化。由此,在文獻文化史框架下,作為“景觀”的石刻文獻呈現出獨特的二重性。作者特別關注刻工這個潛隱群體,提煉出石刻作為“尤物”“禮物”“方物”“文物”的特色,凸顯石刻作為物質文化載體參與文化建構的意義。

卷九金程宇《漢籍東傳與東亞漢文化圈》指出漢籍東傳是促使東亞文明格局發生變化的動力之一。漢籍東傳的起點並非地理涵義上的中國,而是中國

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終點也不是地理涵義上的日本、朝鮮等國或個別某國的文化，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漢文化圈。本卷通過對漢籍東傳時間、種類、途徑、特點、域外典藏情況的考論，展現東亞古典學與漢文化圈的互動。

卷十為程章燦、許勇編《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史料輯要》，第一部分彙集歷代著作中與文獻生成、載體、流散、整理與收藏相關的重要論述，首次建構古代文獻文化的傳統論述框架。第二部分為與文獻文化史相關的國外重要論著提要，格外注重海外書籍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總體而言，叢書始終圍繞“文獻文化史”這一核心命題展開論述，有著一貫的時代關懷和多元的研究取徑，體現出四個鮮明的特點。其一，在書籍史關照下，尤其注意古典文獻的本土特色。首卷提出傳統文獻具備連續性、穩定性與精英性，均是與西方書籍特色比較之下有為而發，其連續性衍生對近世以前文獻的重視，穩定性衍生對傳承理路的探求，精英性則是相對西方書籍史偏向大眾文化而提出。以文獻類型而言，叢書將研究範圍從書籍擴充為文獻，以容納簡帛卷軸、金石刻鏤、檔案文書等，提倡寫本、印本、拓本並重。這一特點充分體現於卷八對石刻文獻的專論，以及卷五、卷六對各類型文獻材料的應用。以文獻年代而言，一改西方書籍史對近世書籍的偏好，上溯至先秦兩漢文獻，強調簡牘時代、寫本時代與印本時代並重，反映傳統中國的悠久歷史。以研究方法而言，叢書重視對傳統文獻學方法的繼承，例如卷四、卷七、卷九立足編纂學、目錄學、版本學，分析文獻對文化的影響。

其二，注重文獻與人的互動，著眼於“文獻-人-文化”的複雜關係。一方面，出於對社會文化的關懷，叢書重視文獻的生產、傳播、閱讀者，發掘以往被忽略的中下層群體。如卷二指出民間學者對於讖緯文獻體系的建構與推動，卷五強調民間編纂者、出版者與閱讀者如何重塑明代圖書生產，卷八發掘隱於石刻背後的刻工群體對石刻形態的影響，以及卷六將視點聚焦於文獻之下和之後的書估、抄手、女性等群體。另一方面，立足中國文獻特色，強調其精英性的一面，如卷二論述先秦諸子對經典文化的建構，卷四指出文化精英如呂祖謙對文獻的整理與傳承，卷七揭示文獻傳承相當程度上依賴於皇家意志與士人自覺等。

其三，始終在動態過程中考慮文獻的文化與文化的文獻，注重二者的相互

影響。其中,卷二注意變化的文獻觀念與文獻觀念的變化,考察經典的形成而非具體的經典;卷三置中古史部文獻於變化的文獻生產技術背景之上考量,又指出魏晉時期“類”的思想形成與傳記文本的關聯;卷五據《祝趙始末》,在糾紛社會史的框架中討論文書、印刷與社會行動的複雜關係;卷六提倡文獻集群與人的群體之交集,如家集編纂的盛行與清代家族、地域觀念生成的彼此影響;卷九考察漢籍東傳與回傳的歷史過程,以凸顯其文化演變。

其四,放棄了通史的寫法,充分發揮各卷作者的學術特點,對文獻文化史進行重點突破。叢書並有視野的開闊和發掘的深入:在世界史視野之下注意地域與全局的關聯,不僅卷九專論漢籍東傳對整個東亞文化圈的文化塑造,卷四亦專章考察比較視野下的《古文真寶》之流傳,卷六、卷七還關注到晚清新學書籍對國人的知識、思想的衝擊。而卷二、卷三、卷八則分別專注於早期文獻的思想史歷程、中古史部文獻、石刻文獻的歷史文化,以一持萬,不落於大而全的陷阱。叢書方法的多元與精準共存:運用多學科研究方法,在文獻層面繼承發展傳統校讎學、目錄學、版本學、典藏學、編纂學知識;在歷史層面,綜合技術史、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方法而言之有物,如卷五第八章借鑒經濟史統計學的方法分析圖書價格,卷六第十章使用技術史視角討論石印出版文化,卷一、卷二則多采學術史、思想史方法切入古典文獻的脈絡;在文化層面,結合當代文化研究理論,如新文化史、物質文化研究、傳播學等,更好地揭示古典文獻的文化內涵,如卷八以物質文化切入古代石刻,卷九結合傳播學考察漢籍東傳等等。

可以認為,《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是對“中國”“古代”“文獻”與“文化史”的同時超越。它在世界史比較視野之下理解“中國”,以“文獻”超越“書籍”的限制的同時,將文獻從對象轉換為方法,又以自身文獻傳統重審文化與“文化史”研究,最終回應時代的關懷。總之,叢書志在建構一種新的研究視野與方法(如果不能說範式的話),以文獻切入文化,以歷史反觀自身,由群體審視整體。只有在這種大的關懷下,才能理解“文獻文化史”之深刻意義。

(作者: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 汪斌)